文论天地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文艺研究

梁胜明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当然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包括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长足发展。首先是在方针政策层面上，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深刻教训，根据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突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单一模式，提出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系统而完整的文艺方针政策，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其次是在理论体系层面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破了以反映论考察文学艺术的单一模式，从不同角度描绘文艺的整体面貌。对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构成、创作、接受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更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由于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原因，特别是由于文艺界部分学人存在着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倾向，没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完全摆脱机械僵化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对文艺领域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单向线性思维方式，在论证和强调某一理论形态时，忽视或否定其他的理论形态；在论证或强调某一理论形态内部的某一侧面时，又忽视和否定另一侧面。因而我们的文艺论争每每是在上层建筑与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反映论与表现论、客体性与主体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论与艺术生产论、人性论与阶级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认识教育价值与审美娱乐价值、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左右摇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笔墨纸张。

作为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最完备最深刻而无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统一整体，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一切事物内部均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正是这两个方面又斗争、又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转化和发展。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就会发现文艺的本质和规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有机整体，是多种关系与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结构，都存在着辩证的联系。各种理论观念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和一定的局限，对文艺理论的整个体系都有片面的深刻的真理的成分，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每种理论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虽有上次之分，但又都是既相悖又互补的，不能完全肯定一个方面而完全否定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各种理论及其内部两个方面进行辩论的整合，将其摆放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适当位置上。

比如，关于文艺的反映论与表现论，客体性与主体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艺作品作为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当然就包含着作为被反映着的社会生活的客体与作为反映者的文艺家的主体两个方面。文艺作品既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作为主体的文艺家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文艺的反映论与表现论或客体性与主体性，就成为彼此不可替代或置换的两种理论或两个方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文艺的反映论和客体性，但并没有否定文艺的表现论和主体性。新时期以来，有的学人强调表现论和主体性，这对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是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的。但有的学者却高扬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自我表现论”和“自我实现论”，把表现论和主体性推崇到完全排斥反映论和客体性的程度，这就走向极端荒谬的地步了。过去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忽视文艺的艺术生产属性、商品价值和经济效益，文艺发展采取由国家统包的“事业型”发展模式。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革，文化作为第三产业开始了由“事业型”模式向“企业型”模式的转变，这当然是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的。但一些学人却又忽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精神价值和社会效益，鼓吹精神生产商品化，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歪风。这又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激烈的争鸣与论辩，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终于逐步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单向线性思维模式。通过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够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方式观察文艺现象和研究文艺问题，对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构建一个主导和多样统一的合理有序的宏大体系，把文艺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和新水平。



音乐“三多三少”之忧

张象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需求，音乐领域中存在的“三多三少”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所谓“三多三少”：一是歌手大赛、选秀活动多，大众歌咏活动少。前者能推出新人，提高歌咏水平，举办活动无可非议，问题是与后者的开展不平衡，造成重视前者轻视后者的倾向。后者是各行各业普通人的“大家唱”，自娱自乐，自我激励，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这种“大家唱”是产生时代音响的土壤。《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等这样一些有历史特征的歌曲，都是与大众歌咏结合之后，才成为时代的声音。而当下缺少这样公认的代表性歌曲，不能不引人深思。据有关方面透露，每年有10多万首新歌问世，普及率很低，能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也寥寥无几。最近评选“30年30首流行金曲”只有一首是2000年后唱响的。奥运会征歌6万—7万首，因未与群众见面，基本报废，是精神财富的浪费，令人遗憾！

二是非专业机构组织的音乐活动多，专业机构搞得相对较少。电视台是综合性机构，搞音乐不是它的主要业务，但目前它组织的活动不仅名堂多，且有声有色。而音协、音院、群艺馆等专业机构的活动则相形见绌。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歌曲评选，影响很小，有人说搞娱乐活动谁搞都一样，不必计较。其实不然，这是关系音乐事业能否正常发展的问题。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使国际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并能树立起一种崇高文明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与组织者能理顺与各国政府、媒体、赞助商等方面的关系分不开的。而目前一些媒体搞的音乐活动则不然，演唱者甚至是大众演唱成员都是按媒体计划去作秀，这样产生的是扭曲的影响。又由于媒体与商业利益挂钩，它必然要炒作、宣传、包装，常常一夜之间就能树立起一个让青年们崇拜的偶像歌星。一旦虚假成分败露，神坛破灭，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如何使专业的音乐机构充分发挥其功能，使它们不断走向社会，走入群众中去，是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

三是演唱者收入多，词曲原创者收入少。多年前人们议论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元”现象更严重了，不少词曲作家如不自付版面费就难以发表歌曲。这不是一般的分配不公的问题。贬低原创劳动价值的“倒挂”现象的存在，关系到要不要按艺术规律办事，音乐事业要不要科学地发展。众所周知，音乐规律要经历三度创作：首先是词曲作家根据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进行一度创作，这是基础；然后是演唱者和演奏者的二度创作；最后是群众的品尝、筛选进行三度创作，这一关常常决定作品的命运。如果没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斯特拉文斯基等一代代原创音乐家的创作，就没有从古典主义音乐到现代主义音乐的一浪浪高潮。如果没有聂耳、冼星海的群众歌曲，中国音乐史该如何写？改革开放要创造中国音乐的新辉煌，不正视历史经验和规律怎么行呢？

音乐是依赖听觉的情感艺术，它有娱乐功能，也有审美教育功能；它有宣传鼓动作用，也有保健医疗作用。构建和谐社会、和睦人际关系需要音乐活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民文化素质需要音乐教育；迎接老龄社会需要音乐给老人们带来美好的心情；加强国家交流也需要音乐这种“世界语言”发挥独特作用。

现阶段的音乐活动应该是多方面、多样性的。既应有群众音乐，也应有一些高雅音乐；既要有通俗流行音乐，也需要有严肃的学院派音乐；既要有民族的，以至原生态音乐，也要引进国外的有各国各地区特色的音乐。这是时代的需要，民生的需要。愿文化部门不断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理顺各方面关系，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百花争艳，万紫千红。

文艺点评

中国散文三十年

吴泰昌



编选《改革开放30年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检视30年来散文园地的种植，我感到一种巨大的丰收的喜悦。

如何评估新时期30年来的散文创作，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我认为，30年散文的喜人成就，文学界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这30年，散文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文体的创作一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诚然，这期间的散文不曾有过新时期之初小说、诗歌与报告文学那样的轰动效应，不曾有过街谈巷议、洛阳纸贵的震撼。中国作家协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报告文学、新诗、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文学门类的评奖活动，但直到1989年才首次主办新时期（1976—1988）全国优秀散文（集）评选。比小说、新诗与报告文学的全国评奖晚了多年，但这并不能充分说明散文没有随时代一起前进，没有获得读者大众的青睐。

散文难以产生社会轰动效应，有其文体本身的原因。新时期之初，散文界多数人恪守传统的“大散文”的概念，不认为散文仅是抒情遣兴之作，感时咏志、怀人伤逝、山川风物、叙事纪实、随笔小品、文谈书话、日记简书、序跋杂述等均是散文的方方面面，散文创作书写的内容和涉及的领域显然是宽广的。新时期之初，对散文文体的创新尚不遑多顾，因此散文的形式仍多固守“五四”以来的边界。但在思想方面的探索却更专注，更用力，因而取得了重大的收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极大地激活了众多好散文篇章的问世。巴金《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思想解放的闸门，重新接续了中国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巴金说真话的散文破除了散文界长期以来的所谓大抒“革命的豪言壮语”、“革命浪漫主义”束缚，重新直面真切的现实历史和人生情怀，提倡独立思考，关心国运民瘼，不仅赢得了广大读者，而且对新时期散文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散文迎来了百花竞放万紫千红的嘉年华会。散文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今天。90年代以来的散文一方面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始重视形式的探索和文体的创新，如“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新散文”等，无论如何命名，有无一致认同，都反映了散文走向多形式、多流派、多样化的兴旺格局。另一方面，散文继续进行思想与个性的深入开掘与拓展，散文作家除了关注国计民生、社会和谐，也越来越多地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等。散文的作者队伍也一天天地扩充，写散文的人比写小说、写诗歌的人要多得多：主要以其它文体创作的作家也写散文，艺术家、学者、科学家、新闻工作者、党政干部、普通百姓等也在写。90年代以来也是报刊和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与日俱增的各种媒体对散文的需求量巨大，为散文提供了比其它文体更为宽阔的园地。可以说，当前散文从内容的深广到形式的多样，从队伍的壮大到园地的丰富，从质的良优到量的繁多，都是新时期以来文学门类中突出的。

散文这一文体更能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对时政、社会现实的意见和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以散文的形式更为便捷和随意。这也是写散文者众、散文日益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写作门槛的降低也带来了对散文的某些误解：以为散文人人都能写，以为写出的无韵的文字都可称为散文。近些年来还有一种倾向，即散文的个人化、私人化，作者完全不问世事，躲进一己的天地，写茶杯里的风波。从本书所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散文绝对是需要艰苦探索、匠心经营的艺术；优秀的散文总是与时代、与现实紧密相联的，是直接反映或折射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动现实的。

编选本书，乃欲建造一道散文走廊，简明地展示30年的散文成就，并与读者一起回顾、品味、思考和眺望，让散文的路子越走越宽广，让散文的传世名篇越来越多地涌现。

无解的施宜生

——看京剧《北风紧》

张帆

一边是温婉江南故土故人，一边是苍莽北国娇妻爱子，一边曾弃他辱他轻薄他，一边曾救他敬他器重他；时值宋金两国南北对峙之际，京剧《北风紧》一开场，剧作者就将仕金宋人——福建浦城人施宜生，推到一个两难的险峰：不是辜负了有养育之恩的宋国，就是辜负了有知遇之恩的金国，他在关系微妙的宋金两国之间徘徊。

厄运从施宜生作为金国正使出访宋国开始，随行的副使古离罕受金主之命暗中查探宋国边防，欲攻其不备。施宜生得知后，陷入是否向宋人透露消息的两难矛盾之中，于是写下藏头诗并在手掌之中暗书“北风紧”三字，向宋人示警。对于他来说，故国是牵着一指、疼钻入心，新国则是知遇恩深、职责所在。一边是情，一边是责，加上妻儿岳父这些人，就变成肩头深重的债了，如果说对宋国与中原文化的维护是出乎他的本能，那么对金国的忧心则是一种近于还债式的报恩心理了。

命运把施宜生逼到绝境，最后坦荡荡的施宜生向金主直陈自己借着出使宋国泄露金军即将攻宋的绝密信息，准备以死谢罪。金主大为震怒，下令诛杀施宜生，恰恰此时，攻打宋国的大将军生还回朝，宋朝也派人来言和，宋金关系缓和。金主吩咐把施宜生召回来，可他逃出死亡的深渊就可以摆脱歉疚感吗？南国是故土，北国是亲人，七魂六魄要归于何方？永远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施宜生无处可逃，注定煎熬。

在这部戏所设置的特定情境中，施宜生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他陷入了自己内心种种假设的道德冲突中。如果他够无耻，他可以置故国于不顾，好好当他的金国尚书，乐享天伦；如果他够无情，回到宋国后，他可以抛弃妻儿，不返金国；如果他够无义，他也可以不再北上阻止金国出兵，倒省了许多百转千回的肝肠寸断。但这些都不是施宜生——这位被儒家文化浸染的南方人，礼义廉耻四个字总是摆在第一位。背叛与再次背叛，都不是因为个人私利，理解他的妻子标艳说出他的心声：“岂知他既不为了扬名，也不图高官厚禄，却是为了何来？”施宜生超越了个体利益，也超越了两国利益的羁绊，以儒家的核心精神“仁义”来衡量与取舍，因此在行动上处处为难、处处受缚，但是恰恰就是通过这一条两难的荆棘之途建构了他趋近于完美的儒家道德世界，而诚实、仁爱、知恩图报、勇于承担，这些实际上也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施宜生为了追求完美的道德理念甚至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但他错了，这种责任却恰恰不是一个人的肩能扛得住的。一介卑微的文官，在利益对立国家大机器面前，能扛得起什么？他的死虽然可以延缓战争的脚步，但阻止不了最终的战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徒徒然在亲友心间留下伤痕。个人命运与两国利益绞在一起，任何一种选择，都会利于一方而损于另一方，根本不存在两全之策，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对他来说都是错、都是罪。面对这个两难问题，剧中人不知道怎么办、观众不知道怎么办，连故事的叙述者——剧作家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本剧虽然追溯了为什么的原因，却永远没有怎么办的答案。

本剧震撼人心的也恰恰在于施宜生始终无法安宁的心灵徘徊于两难情境，在煎熬与抉择中，营造出浓重的宿命般的悲情，营造出深重而密致的、痛苦到难以喘息的氛围，这使得京剧《北风紧》带上了悲剧的品格。

（左上图为田磊在京剧《北风紧》中扮演的主人公施宜生。）

学界新论

当代视野下的女性文学

吉林大学文学院 修磊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时代主旋律开始发生改变，思想解放的大潮使人们开始对历史、对社会和对人自身进行反思，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得以觉醒。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自己，她们开始真正地对自身的性别地位加以审视，她们开始追问，作为女人，她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女人在社会时代变迁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她们感受到了女性的困境：一方面面临着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矛盾。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女性文学开始了女性生命本体意识的勃兴。中国女作家开始走出单一的社会批判、社会心理误区的揭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性格的批判，走向对女性的自我找寻和自我审视，进入了一个对女性生命本体意识进行探索的时代。所谓女性生命本体意识，是指女性独特的生理体验、生命欲望、性意识乃至整个女性生命流程。这个转变是女性文学意识的自觉与文化意识的自觉，因为她们渐渐意识到女性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女性历史的创造者，在探索女性命运的过程中，女性自身是不能缺席的。发展到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进入了多元的繁荣期。在这个思想活跃、各种社会思潮包容并蓄的时代，西方女性主义各流派也渐渐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更多女作家的视野和创作理念中，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也促使女作家们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放于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不再囿于男女性别之争这一狭小天地。越来越多的受到过现代教育熏陶的知识女性开始拿起手中的笔，去客观地再现现实生存中的男人和女人、去关注生活中的幸与不幸、表现时代大潮中的情感与寄托，这就促成了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多元化与繁荣。这种多元化不仅表现在作品本身的丰富多彩，而且表现在作家本身的多元构成。

当代视野下的女性文学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是更强的性别意识。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这类作品特别注重性别意识，强化女性内心精神世界的个人化写作。这种以女性意识为基础、为核心的女性文学的出现使得文学视界、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也使得文学向着完美方向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二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在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在艺术表现上，女作家们把“我”推向前台，走向个体化，普遍摒弃宏大叙事、重大题材，以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对抗宏大叙事。从儿女情、家务事等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个人经验、个人记忆成为女性作家书写的中心，很多女作家的小说带有精神自传的特点。较典型的就是武汉作家池莉的系列作品，如《生活秀》、《来来往往》等。三是大胆的身体写作。“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必定要经历的一道风景。在现代女性文学中，“身体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女性写作”的一个极端是：她们的“身体写作”变成了对于女性身体的展示，她们的女性意识也演变成女性的“性意识”。但怎样用自己占主动位置的方式向男性和整个社会传达这种觉悟？就需要在第一步走出去之后，想要获得与男性同样地位最终达到和谐的“大同社会”就不能滞留于此。虽然她们的作品也为女性的写作开拓了更新的空间，提供了诸多她们的前辈所没有的、新一代人的体验与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也因走得太远反而与女性主义的诸多主张背道而驰。更何况，现在一些被市场操控，被男性窥视欲望利用的女性作家则是停在“揭竿”之举上，反复地揭来揭去，长此以往，怎样达到最终的目标？

由此可以看出：当下女性文学性别姿态更加放松，审美态度由激烈趋向平和，性别对抗不再成为烛照女性命运的主要文化背景。女作家们以一种全面的，真实的认识女性和表现女性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观照社会和人生，以自觉的写作来彰显女性写作的独立意义。可以说，中国的女性文学正在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并没有把中国的女性写作引入一种狭窄和封闭的境地，而是恰恰相反，它正以一种开放的、生长性的方式开创着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更加自由多元的境界。

从2009年起，“文艺评论”版新设“学界新论”专栏，集中刊发高校、党校各学科师生论述文学艺术诸领域的新论，字数以2000字左右为宜，欢迎赐稿。来稿请寄：100733，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学界新论”编辑收。

——编 者

30年中国电影艺术成就座谈会举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艺术成就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们从电影艺术美学及电影叙事，电影语言的创新性，电影导演风格多样化分析、电影艺术理论的反思与流变、外域电影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改革开放颂”诗歌大赛在京颁奖

由诗刊社主办的“改革开放颂”全国诗歌大赛，日前举行了颁奖会。共有8000多篇作品参赛，丘树宏、阎志等诗人获奖。由中共广东中山市委宣传部在此基础上编选《白猫黑猫——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颂诗》一书将近期出版。

《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获嘉评

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中国乡村妇女生活调查——随州调查》。作品反映30年来我国农村妇女生活现状，作者吴治平历时4年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吃住在农户，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以原生态形式真实地表现了出来。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小视角、大视野关注当代农村妇女所经历和面临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村妇女的喜怒哀乐，专家将此书誉为“在希望田野上的希望之花”。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daily.com.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901、65368903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59、65368760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9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3时20分 印完：5时40分